

八百年镇江基督教

张大华

[内容提要]基督教的传入是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本文系统研究了八百年来基督教在镇江传播、发展的情况,尤其是近现代对镇江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了“三自”道路才是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生存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关键词] 镇江基督教

镇江作为中国古老的开放城市、经济文化中心,是基督宗教传入较早的地区。在长达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基督教在镇江传播、立足、生根、发展,留下了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丰富史料。镇江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一个样本性城市。

(一)

元代基督教在镇江的传播,是现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元代《至顺镇江志》,准确记录了在至顺年间(1330—1332年),基督教在镇江传播的状况,全市信仰基督宗教的“也里可温”计有“23户106人”。当时侨居镇江的外来户,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契丹人等共3845户13503人,也里可温人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每167户中有1户,每63人中有1人^①,由此可见,当时镇江信奉基督教的人户占流动人口的比例要超过现在。

^① 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

元代基督教在镇江迅速传播,是与著名的基督教人物马薛里吉思分不开的。有关马薛里吉思在镇江推广基督教的情况,在著名的《大兴国寺碑记》^②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出生在中东的基督教世家,整个家族世代行医,因医术高明,祖辈、父辈都被招为御医。1268年,马薛里吉思也被招入宫中担当御医,由于深受皇上信任,他被派到云南、闽浙为官,1278年,他被授予明威将军,到镇江任达鲁花赤。三年后辞职,居于镇江,在当时镇江行政区域内,专门从事推广基督教活动,一共兴建了七座基督教堂。

这七座教堂,在镇江境内的有六座,还有一座在杭州。分别为铁瓮城的大兴国寺,云台山上的云山寺、聚明寺,丹徒县开沙的渎安寺,登云门外的高安寺、甘泉寺和杭州荐桥门外的晋兴寺。大兴国寺是他所建的第一所教堂,教堂建成后,镇江儒学教授梁相专门撰文列碑记载。这块碑刻在元代末期已经淹没,但全部碑文被收录在了《至顺镇江志》中,被完整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③一样著名的古碑,是国内外研究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传播情况的珍贵史料。

马可·波罗任扬州宣慰史的第二年(1284年),曾游历镇江,他现场访问了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建设的这些教堂,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了准确记载^④,他说:“城里有3个聂斯托利派^⑤的基督教堂,建于

^②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

^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基督教在唐代得到六代皇帝关心,流行150年,传到100个城市的情况。此碑在明代出土,清代被传教士介绍到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现藏于西安碑林。

^④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张大华著《镇江文化旅游》第139页,上海社科出版社,2005年3月。

^⑤ 聂斯托利派是公元七世纪被正统派斥为异端的一个基督教派别,后来经过两个世纪在波斯和中亚一带流传和发展,在唐代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教派自称为“景教”,取“光明正大之教”意思。

1278年,那时候,皇帝陛下曾任命这一教派的一个教徒,名叫马萨奇斯(Mar-sachis)的,来这里担任本城的行政长官。任期三年之久。在他上任之前,这里原来没有教堂,是马萨奇斯来了以后才创建的,至今保存完好”。

马薛里吉思在云台山上建造的两座基督教堂,是金山寺的土地。早在宋代,朝廷已经把云台山划给了金山寺,马薛里吉思在金山寺的土地上建教堂,引起了镇江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产生过激烈冲突。三十年后,金仁宗即位,他为了调和国内矛盾,开始重视佛教,这时金山寺方丈应声长老向朝廷状告基督徒侵占金山寺土地,挑起宗教矛盾。这个上告,得到了金仁宗重视,亲自御批:“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判令拆毁基督教堂,将已建好的两座基督堂改为金山寺下院。并派宣政院断事官泼间和建设北京白塔寺的雕塑家刘高到镇江落实皇帝的御旨。刘高在镇江期间,在山下的西津渡按照北京白塔的样式,建设了一座过街石塔,这就是现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昭关石塔。

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建云山寺和聚明寺的时间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仁宗皇帝御批将这个基督教堂拆除,将云台山还给金山寺的时间是至大四年(1311年),前后共32年。在云台山归还金山寺后,金山寺对原有基督教堂进行了改造,建起了佛教寺院。在寺院建好后,元仁宗皇帝命集贤学士、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和翰林学士潘昂霄分别撰文立碑,陈列在寺院内,并令“金山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罚以重论”^⑥。

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在中国销声匿迹。但随着《马可波

^⑥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任继愈《基督教史》第393-39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罗游记》的介绍和“大兴国寺碑”的记载,使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了镇江的繁荣和富庶,了解了基督文化对古老镇江的影响。

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丹阳传教并建有教堂,到了清初,由于罗马教廷与清政府间爆发“中国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下令禁教而中止。

(二)

鸦片战争以后,镇江作为中国南北漕运要地和东南地区的经济、军事重镇,是基督教^⑦大举进入的地区,当时几乎所有在华传教的基督教派别都把触角伸到了镇江,把镇江作为向苏北和运河、长江两岸渗透的前进阵地,其中内地会、长老会、浸礼会、卫理会、圣公会、神的教会、基督教聚会处、安息日会等宗派,在镇江市区共建有教堂、聚会点十多处(见附录一)。此外,镇江周边的上党、丹徒、谏壁、辛丰等乡镇和丹阳、句容、扬中等辖区也建有基督教堂。

现在位于大西路343号的福音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座(见附图一)。它是1889年由美国传教士郎登·库思非所建。这所教堂坐南朝北,砖木结构,采用木质人字梁支撑屋顶,正面墙上正中有圆形玫瑰花窗,顶部悬置十字架,在教堂墙上嵌有勒石一方,上刻“耶稣诞辰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字样。教堂四周建有围墙,临大西路门口砌横额石刻“福音堂”三大字。在教堂南边,还建有一座红、青砖间砌的铁皮顶四层楼

^⑦ 我国所说的基督教在西方统称为新教,天主教在西方称为罗马基督教或罗马公教。这是基督教的两个派别,在我国作为不同宗教称呼和对待。新教是西方宗教改革后产生的基督教新派别,是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的主要力量。在清代康熙年间以前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含唐代的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是我国现在称呼的天主教。天主教一词是明代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后提请罗马教廷确定的、对罗马公教在中国的统一翻译名称,这是中国天主教一词的由来。

房,门首横额石上刻“崇德学校”四字,墙脚处还嵌有一块刻“1918”字样的建筑纪年勒石。该楼为当年基督教会办的教会学校。现在这个教堂保存完好,是镇江市基督教“两会”的所在地,教堂内的讲坛、联椅,都是当时的原物。

在众多的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赛兆祥和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

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年8月13日-1931年8月31日),乃美国南长老会来华的著名传教士。

1883年,赛兆祥携新婚妻子卡罗琳来华,先到传教士集中的杭州从事传教活动。五年后的1887年,他受教会派遣,与林嘉善(Edgar Woods)牧师一起沿京杭大运河,经镇江渡江北上,抵达江苏北部京杭大运河畔的商业重镇清江浦(今淮安市清河区、清浦区核心区域)进行传教,是美南长老会江北教区(North Kiangsu Mission)的开创性人物。他以清江浦为基础,以后又陆续开辟了宿迁(1893年)、徐州(1896年)、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1904年)等传教站,由于其信仰虔诚,传教热忱,不避艰难,不辞劳苦,并兴办医院学校,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广泛传播现代卫生知识和生活方式,“待人以诚,爱人如己,救人之急,解人之危”(见附录二),终于克服了种种文化障碍,使美国南长老会得以在江苏北部的城乡深深扎根。

赛兆祥和卡罗琳在中国共生育了四个孩子,有三个都死于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于是在发现卡罗琳怀孕后,赛兆祥把妻子送回美国休养,在这期间卡罗琳为赛兆祥生下了唯一长大的女儿赛珍珠。1892年10月,赛兆祥夫妇带着4个月的女儿回到清江浦。赛兆祥调往镇江,在镇江润州山创办了男子学校——润州中学;南长老会在登云山顶还为赛兆祥新建了东印度建筑风格的二层楼(至今保存完好,现为镇江赛珍珠纪念馆),作为工作生活的场所。

1921年10月,卡罗琳在镇江逝世,葬于镇江洋人公墓,不久赛兆祥调任南京。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江西庐山山顶牯岭买下了一块面积1727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幢140平方米的小型别墅,红色屋顶,带敞开式的外廊和传统式的老虎窗(今310号别墅),作为度夏休闲和养老的地方。

1931年8月31日,赛兆祥在牯岭别墅去世。由于当时长江流域爆发洪灾,无法实现他与妻子合葬于镇江的愿望,因而在当地安葬。

赛兆祥虽然远去了,但人们对于他的记忆,却因为他优秀的女儿赛珍珠而得到延伸。赛珍珠虽不是传教士,但她作为传教士女儿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其中在镇江生活时间最长,有18年,在镇江度过童年、少年,进入青年。她以中国生活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大地》,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1934年回美国定居后,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一生创作了100多部文学作品,是当时美国家喻户晓、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成名后的赛珍珠,恋恋不忘在中国四十年的生活,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她把20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她邀请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老舍、林语堂、徐志摩到美国访问、创作,帮助他们出版作品,使中国作家作品在美国产生广泛影响,她一生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她逝世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

赛珍珠一生都把镇江作为她的故乡,并为此写了多篇文章和作品介绍她在镇江成长的经历。为纪念这位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巨人,镇江市联合国内外学者,发起成立了国内唯一的专门机构——赛珍珠研究会,新世纪以来先后三次成功举办赛珍珠国际研讨会。并在2006年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10集电视专题片《寻找赛珍珠》,介绍赛珍珠在中国成长的经历和为中美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在中央电视台和欧美、日韩等国播出。

在投入巨资整修后,镇江市利用赛兆祥、赛珍珠故居,建立了赛珍珠纪念馆(见附图二),常年对外开放;在市区风景优美的古运河畔,命名了珍珠路、珍珠桥,建立了专供市民休闲健身的赛珍珠广场(见附图三)。

如今,赛珍珠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经融入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数千年来镇江开放胸襟的时代注脚。

戴德生是英国基督教教会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从1854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一生组织了1000多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建立了270个传教站,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传教士。在镇江当时最热闹繁忙的京几路旁,他有一幢诊所、药房、居家三位一体的三层楼房,他在长沙逝世后,人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运到镇江,安葬在牛皮坡洋人公墓,与他的妻子玛丽亚和四个在中国夭折的孩子葬在了一起。1988年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在镇江博物馆发现了完整的戴德生墓的碑石,现在这个碑石已经移至大西路福音堂内辟地建房保存,碑石用英文书写,内容是“恭敬纪念令人尊敬的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他一生常在基督里”(见附图四)。

(三)

基督教大规模进入镇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广泛传播,曾经推动了镇江的对外开放和社会文明进步,推动了镇江现代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社会事业的发展。镇江最早的现代小学、中学、医院、孤儿院、救火会,都是由教会创办的,其中由美国长老会创办的润州中学和卫理公会创办的崇实女中,是其中影响和效果较大的学校。这两所中学采用当时西方最新的教材、最新的课程设置和最新的教育理念,把

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聘用具有西方高等教育学历和镇江当地最优秀的国学精英到学校任教,在镇江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学贯东西的精英人才,如著名民主斗士、杰出的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当时在校名叫李晋祥),现代著名银行家赵棣华、徐国懋,著名化学家戴安邦,第一位在美获得博士“金钥匙”最高奖的中国女性王素义,民国将军卫立煌夫人朱韵珩,民国期间曾任中正大学校长的马文焕等等。

在推进传教事业的过程中,一批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教士来到镇江,他们为了心中的信念,忍受文化差异和生活痛苦,扎根民间,在对上帝奉献赤诚的同时,为镇江社会带来了当时西方最新的知识、技术和社会文明理念。他们中的许多人举家到镇江生活,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曾经意外的获得一份牛皮坡洋人公墓埋葬者名单(见附录三),在全部43名死亡者中,最早埋葬的是在1865年,最后一位是1925年,这其中包括著名传教士戴德生夫妇。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一方面是为了神圣的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也在为所在国家的海外扩张政策服务。尤其是在传教事业与国家利益目标不一致时,他们首先选择的是所在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上帝的事业,包括宣称“假如我有成千英镑,中国可以悉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的戴德生,也不例外。

细细分析近代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每一个不平等条约,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条约产生的台前幕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842年7月发生的鸦片战争镇江保卫战。在这次战役中,英军集中在远东地区的全部军舰和兵力,孤注一掷,进攻镇江,目的是扼住中国漕运咽喉,迫使清政府就范。这是英军首次孤军深入中国内河作战,是一次犯了兵家大忌的冒险行动,当时只要中国军队在江阴等地采取阻断航道措施,英军庞大的舰队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尤其是在

英军的进攻受到镇江军民顽强抵抗,英军内爆发严重传染病致使减员严重的情况后,英军统帅卜鼎查产生了动摇。在他打算撤军的紧要关头,担任侵略军情报总管和翻译的随军传教士马儒翰(马礼逊之子),力劝卜鼎查继续强力进攻。最后英军以数倍于清军的兵力和装备组织总攻,结果以惨重的代价占领了镇江。

侵略者占领镇江后,另一个作为侵略军后勤总管的传教士郭实腊,被侵略军任命为镇江城行政长官^⑧。在这场战争中,传教士由帮凶变为战争的主谋和主角。这虽然是信徒的个人行为,但传教士的特定身份,使这种恶劣行为与基督宗教扯上了永远撇不清的关系,成为基督宗教传播史上最肮脏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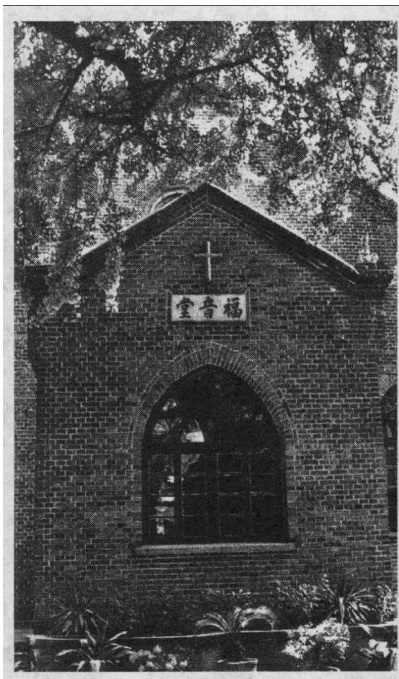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全国发生的数千件“教案”中,丹阳教案在近年来被经常提起。1891年4月25日,丹阳人发现教会的墓地上埋葬了70多个儿童尸体,同时,教会育婴堂的儿童一个也没有了,遂产生公愤,群起将教堂焚毁,并因此引起无锡、宜兴、江阴、如皋等6县连锁反应。事件发生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将与事件有关的6县县令全部革职,逮捕了21人入狱,并赔偿白银12万两以平息事态。教案发生时,在丹阳任县令的正是如今著名的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当时刘坤一要求县令查文清将为首两人斩首示众,而金庸的爷爷却暗中通知两人逃走,并上报说教案的引起完全是“传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并无为首之人”。多年后查文清逝世,丹阳专门组成坤民吊唁团到他老家海宁祭奠,那两位被他放走的丹阳人,更是一步一叩首,从丹阳到海宁去祭奠。金庸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爷爷的高尚行为,并为此自豪,曾经

^⑧ 沈承恩“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6月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17-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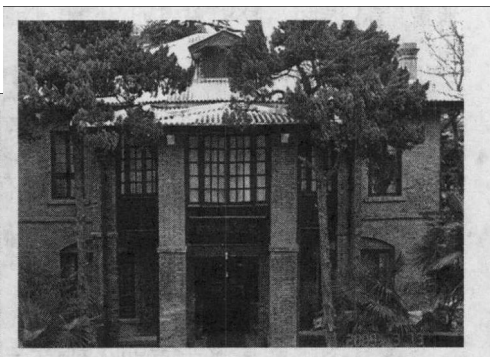
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丹阳教案,因此又进入了历史学界的视线。

义和团运动以后,基督教内的中外有识之士,发起了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运动,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特别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基督教终于割断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教会的依附关系,走上了自传、自治、自养的道路,使这个在中国几度传入几度失败的世界最大宗教,在中华大地找到了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文物协会会员、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理事、镇江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附图一:1889年建于镇江大西路闹市区的“福音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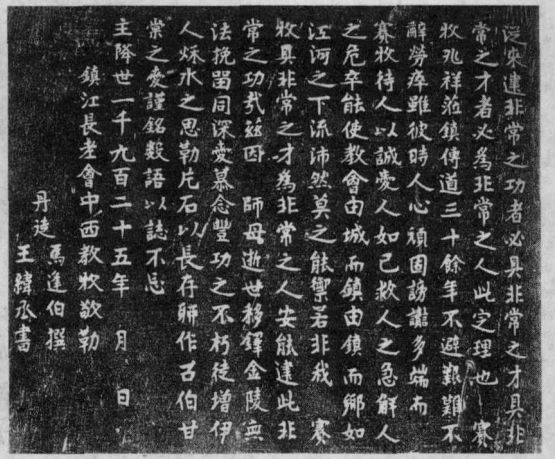
附图二:在镇江风车山赛珍珠故居建立的赛珍珠纪念馆



附图三:2005年建于镇江古运河畔赛珍珠广场的“赛珍珠纪念碑”



附图四：现保存在镇江“福音堂”的戴德生墓碑



附图五：赛兆祥碑

附录一：解放前各基督教会在镇江市创办的基督教堂

教堂名称	堂址	建堂时间	所属教会
第一浸会堂	银山门	1885年	浸会
大西路福音堂	大西路	1889年	美以美会
内地会教堂	伯先路	清同治年间	内地会
伦敦会教堂	不详	清同治年间	伦敦会
西门教堂	大西路	1911年	长老会
润中浸信会教堂	五条街	1918年	浸会
润南堂	南门外大街	不详	长老会
真道堂	宝盖路	1931年	神的教会
小码头福音堂	小码头街	1932年	美以美会
山训堂	义士路	1936年	圣公会
聚会处教堂	西府街	1947年	基督教聚会处
安息会教堂	新马路	1950年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说明：资料来源于1990年版《镇江年鉴》。对这个资料有两点怀疑，一是同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内地会教堂和伦敦教堂应该是同一教堂，因为建立这两处教堂的戴德生，开始是英国伦敦会派到中国的牧师，他后来创立了内地会，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道的最大教会，由于几十年社会变迁，后来者将他创建的同一教堂，因为教派的不同而误认为是两个教堂了；二是位于西府街的聚会处教堂和新马路的安息会教堂，只是聚会点，并不是正式的教堂。以此计算，解放前的镇江市有教堂9座、

聚会处2个。为此,我求证解放前即已入教的前江苏省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镇江市“三自”会主席胡士辉牧师,他认可我的看法。

附录二:赛兆祥墓碑全文如下:

从来建非常之功者,必具非常之才。具非常之才者,必为非常之人。此定理也。赛牧兆祥莅镇三十余年,不避艰难,不辞劳瘁,虽彼时人心顽固,谤讟(音dú)多端,而赛牧待人以诚,爱人如己,救人之急,解人之危,卒能使教会由城而镇,由镇而乡,如江河之下流,沛然莫之能御。若非我赛牧具非常之才,为非常之人,安能建此非常之功哉!兹因师母逝世,移铎金陵,无法挽留,同深爱慕,念丰功之不朽,徒增伊人秋水之思,勒片石以长存,聊作召伯甘棠之爱,谨铭数语,以志不忘。

主降世一千九百二十五年

镇江长老会中西教牧敬勒

丹徒马逢伯撰 王纬丞书

碑文说明:1921年10月19日,其妻凯丽病逝,安葬在镇江云台山牛皮坡洋人公墓。丧事办完未多日,赛兆祥应邀赴宁担任金陵神学院函授部主任。镇江长老会中美牧师及教民感念其功德非常,1925年勒石纪念,并将碑石镶嵌在赛牧师创办的镇江南门外大街教堂润南堂墙壁,以资纪念。该碑石于1999年11月12日城市改造拓宽道路时被发现,现保存在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

附录三:洋人公墓埋葬者名单

第1号(伊丽莎白·蒙查,死于1907年11月23日)

第2号(玛丽·简,英国人 1852年来中国,J·哈德逊·泰勒的妻子,生于1837年1月16日,死于1870年7月23日)

第3号(J·哈德逊·泰勒,英国人 中国内地会创始人,生于1832年5月21日,死于1905年6月3日)

第4号(R·E·A 麦卡托尼,无国籍,无生亡日期)

第5号(F·R·皮克卡诺,死于1865年9月3日,年龄28岁)

第6号(詹姆斯·爱德华·威廉斯,生于1855年2月27日,死亡日期石碑残缺不明)

第7号(索夫多尔·亚历山大,英国人,生于1904年5月1日,死于1905年7月17日)

第8号(艾立奇·哈里特,死于1873年11月7日,年龄5个月)

第9号(查尔斯·休,生于1872年11月25日,死于1873年12月3日)

- 第10号(阿瑟玛丽科·拉科,英国人,生于5月25日,死于1891年8月16日)
- 第11号(042,巴达利,生于1921年11月23日,死于1925年2月4日)
- 第12号(A·W·申格尔,生于1877年3月3日,年龄37岁,死期石碑残缺不明)
- 第13号(泰勒,死于1908年7月31日)
- 第14号(玛丽·安妮,英国人,死于1807年6月7日,年龄8岁)
- 第15号(冈斯坦杰·卢杰,英国人,死于1880年8月27日,年龄10个月零9天)
- 第16号(萨金特,英国人,生于1880年2月10日,死于1909年3月18日)
- 第17号(1887年3月30日立碑,无姓名、国籍,第18号,马特鲁斯·弗朗兹·格雷克,生于1885年8月17日,死于1907年2月11日)
- 第19号(罗西,生于1910年9月10日,死于1912年8月30日)
- 第20号(内那洛娅,死于1817年7月27日)
- 第21号(马穆利,死于1818年6月9日,年龄3岁零8个月)
- 第22号(艾达·安列克拉克,生于1886年4月24日,死于1886年5月8日)
- 第23号(赫伯特·约翰,英国人,生于1889年11月15日,死于1889年12月6日)
- 第24号(威尼费雷德·瓦伦丁·达夫,生于1883年2月14日,死于1885年4月16日)
- 第25号(帕斯卡尔·马丁,1850年10月29日生于宁波,1882年3月5日死于浙江)
- 第26号(里加苏司,死于1881年1月25日,年龄28岁)
- 第27号(科尔·司雷特,生于1843年12月4日,论文043[赛珍珠研究文集第二辑],死于1895年10月6日)
- 第28号(雷德波尔,1892年8月4日死于浙江,年龄21岁)
- 第29号(查尔斯丁·斯努克,1891年9月6日死于浙江,年龄19岁)
- 第30号(空白无字十字架碑)
- 第31号(埃塞尔·梅·莫尔尼斯,生于1881年12月14日,死于1889年8月2日)
- 第32号(埃德加,生于1889年10月3日,死于1890年4月18日)
- 第33号(雷姆普,生于1842年5月7日,死于1887年9月22日)
- 第34号(帕斯特·乔治,死于1900年3月31日,年龄38岁)
- 第35号(马里恩·库佛,生于1895年12月12日,死于1896年3月9日)
- 第36号(瓦尔特·刘易斯·托林芬,生于1840年2月8日,死于1898年8月18日)
- 第37号(阿尔辛,生于1831年11月3日,死于1892年12月28日)
- 第38号(杰鲁恩,无国籍、年龄、生死日期)
- 第39号(尼尔斯,1853年7月19日生于丹麦,1891年2月7日死于镇江)

第40号(巴勒·洛蒂,1900年4月17日生于浙江,年龄19岁)

第41号(威廉·比恩,死于1894年12月10日,年龄58岁,乔治·汤姆,死于1895年8月18日,年龄34岁)

第42号(约翰·达尔帕特,死于1894年7月16日,年龄28岁)

第43号(施尼茨,德国人、德国炮兵教官,死于炮弹爆炸事件,1897年9月21日死于南京)